

湖南作家作品研究·何顿《来生再见》专辑

主持人:湖南师范大学唐伟博士

[主持人语]较之于文学创作,近20年的湖南文学批评,实在是乏善可陈。这并不是说将近20年的湖南文学批评没出成果,而是说其沿袭的美学观念、艺术旨趣以及价值立场,可能仍是苏俄教科书式的文学遗产,这在“欧风美雨”肆虐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格局中,注定很难有一席之地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,“欧风美雨”一定就比“苏俄范式”先进,也不是说我们在批评理论的积累和准备上远远落后于国内同仁,而是说,湖南文学批评确实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。比如将原本具有整体意义的文学批评,机械地肢解为语言、人物、主题、艺术特色等文学各有机元素单位的“合并同类项”——就批评的实践效果而言,此类批评操作模式,无论是对作家、作品本身还是从“理论联系实际”的角度上说,都很难称得上言之有物、行之有效。本组稿件以何顿的《来生再见》为例,试图重新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位极具“地方意义”和“文学产能”的湖南作家。就文学的语言感觉来说,何顿或许算不上是才子型的才华横溢——这或许也是他备受湖南文学批评界冷落的原因?但回顾文学史,但凡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文学经典,又有哪部是逞才使气之作呢?

大爱无言,小说有情

——《来生再见》创作谈

何 顿

(长沙市文联 创作室,湖南 长沙 410005)

[摘 要]《来生再见》的创作源于我文革期间与国民党老兵的接触,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不少被当时正史遮蔽的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历史;创作《来生再见》是为了正视历史、还原历史,以文学的形式,再现那段一度被历史刻意遗忘的抗战历史,缅怀先烈们的英雄事迹。

[关键词]《来生再见》;爱;抗日战争;长沙会战;国民党军队

[中图分类号]I207.42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674-117X(2016)04-0001-03

Silent Love, Affectionate Novel

——On the Creation of *See You Next Life*

HE Dun

(Workshop of Creation, Changsh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, Changsha, 410005 China)

**Abstract:** The creation of *See You Next Life* originates from my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Kuomintang vetera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, from whom I learned much about the anti-Japanese War history of Kuomintang army covered by the official history at that time.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*See You Next Life* is to face up to history and restore the anti-Japanese War history, which was once deliberately forgotten,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, and cherish the memory of our revolutionary martyrs for their heroic deeds.

**Key words:** *See You Next Life*; love; the Anti-Japanese War; Battle of Changsha; Kuomintang army

收稿日期:2016-05-01

作者简介:何顿(1958-),男,湖南郴州人,湖南省长沙市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爱是恒久忍耐、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,不自夸,不张狂,不做害羞的事。不求自己的益处,不轻易发怒,不计算人的恶。不喜欢不义,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,凡事忍耐,爱是永不止息。《圣经》上说的。

大爱无言亦无痕。作家就应该具备这种境界。“爱”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渊源的概念,也是最闪光的情感。许多名家大师都对“爱”的内涵进行过思考和探究。比如英国诗人雪莱说,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。德国作家席勒说,爱能使伟大的灵魂变得更伟大。大爱是一个作家应具有的精神。我们今天的很多人,都被理想欺骗过,不屑于谈理想,似乎理想是个怪胎,连碰都不愿碰,只关心自己,只想着自己。但身为作家,精神上应该有一个高度,要关注社会不公,要关注弱者。关注他们,是作家在精神和情感上的一种自觉。我们一谈到精神,好像就在忽悠人。这年月有些搞怪,甚至正义和神圣的东西都被人恶搞或利用,因而不少人在价值取向上十分迷茫,也就没有人尊重历史,没有人相信崇高,仿佛一切都是假的、编造的。我们是处在一个没有信任、怀疑一切的时代,导致这种困惑的原因很多,追究起来这是物质和精神沦丧的结果,这是不反思历史的结果。身处这个时代的作家,我们要用自己的观察和笔来批判这个时代的弊端。这是我的浅薄意识,也是我努力的方向。

我为什么会写《来生再见》?我童年时候父亲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,我就生活在那所学校的大院里,接触和相识的都是教职工子弟。如果父亲在文革中没被打倒,即使我长大后成了作家,也许我这辈子也不会写国军抗战。为什么这么说?假如我没见过他们,我对他们就不会有感觉,也就没有写作冲动。1966年年中,父亲正要调动,调令都到了学校,只等人来接替我父亲的工作了,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,一切停摆了。翌年,父亲被打成了“当权派、走资派和叛徒”。父亲在湘南游击队从事革命活动时曾被捕过,这个故事我写在《来生再见》里了,这里不赘述。父亲被打倒后,全家人的生活境遇跌到了谷底。1968年,我们家被一师的造反派驱逐出来,赶到了街道上居住。就是在那条街上,我前后认识了一些国军老兵,他们当时还活着,也就是50多岁,活得很压抑。不过那时

我还小,心不在他们身上,感觉不到他们有多压抑,只知道他们属于街道上监管的对象。我第一次听说长沙会战,就是他们告诉我的。那时候我还不相信,因为当时的中小学生的课本上并没有长沙会战,只有淞沪会战、南京大屠杀和平型关大捷以及地道战、地雷战。

后来长大了,见到的东西多了,才晓得湖南抗战打得很惨烈。湖南从1939年9月长沙第一次会战到1945年4至6月,先后打了六次会战。所谓会战,在抗日战争年代,就是日军调动10万军队,国军动用20万军队的战役,就叫会战。30万人你死我活地拼杀,那场面一定很壮观,自然也很恐怖。长沙打了四次会战;1943年还打过一次常德会战。中日军队最后一次会战也是在湖南打的,史称湘西会战,日军要打过雪峰山,攻占芷江机场,但日军没有得逞,被国军歼灭4万多,大败而逃。现在,我们湖南的中小学生的课本上是不是提了这些会战,我不清楚。我们政府,时常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某省修改教科书,蓄意歪曲历史,企图淡化侵华战争和隐蔽南京大屠杀。就南京大屠杀,日本的一些教科书把日军“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”修改为“波及俘虏和居民”;另有教科书删除了“日军的暴行遭到谴责”这样的文字。可是我们自己是怎么做的呢?不是也在抹杀国军的功绩么?难道那些在抗战中阵亡的国军将士不是中国人?在指责别国的时候,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?列宁说,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。正视历史、还原历史,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做的。不然,下一代人、再下一代人就真的知道了。

《来生再见》的前生是《抵抗者》,它是写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,书出版后,总觉得不满意。十年后,我决定重写《抵抗者》。1996至1998年的那段时间,我写了本以江永知青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眺望人生》,他们大多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,全是1964年“贯彻阶级路线”时下乡到江永的。写完《眺望人生》,我在想下一部小说写什么时,我童年和少年见到过的国军老兵,忽然一个个跳到我脑海里了。他们提着一桶桶水踽踽独行,或只身坐在门口纳凉,摇着蒲扇,平淡着脸。他们家徒四壁,生活困窘,在文革期间,属于“地富反坏右”分子,每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,都要自带小板凳去街道

上指定的地方读报学习或接受居委会主任批评教育。当我长大后,就觉得社会待他们薄情,他们虽然是国民党官兵,然而在抗战中却是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。这种思想一旦诞生,就在我脑海里生了根,并且在不断地疯长,好像雨后春笋,一天一个样。那时候,国军抗战还是个禁区,几乎没作家涉猎这类题材。我也犹豫过,但有一个思想在我脑海里盘旋,仿佛是只鹰,一双鹰眼黑亮亮地盯着我,驱赶我朝前走。1998年我动笔写《抵抗者》,1999年底竣稿,当时只写了17万多字。重写《抵抗者》时,我就想大胆展开写,把历史和人物写活、写透,结果加了20万字,写成了《来生再见》。

我曾经对好几家媒体说,那个年代,假如有作家写他们,我也不会写。抗日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,打了14年,正面交锋8年,可是中国没有一部值得称道的抗战小说立足于世界二战小说之林。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缺失,让中国作家蒙羞。当然,这有历史原因,左的年代植根于民众脑袋里的宣传,国民党是拒不抗日的,蒋介石是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。我们小时候就是受的这种教育,小学课本和中学课本上都是这么表述的。这是无视历史。好在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说,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。要知道,当年活着的国民党老兵,听到国家主席、总书记肯定他们抗战,不知有多高兴,不少老兵都流了泪。我相信,这也是广大中国老百姓的思想,尽管今天的中国,很多事情的道德底线都被一些贪婪的损人利己者一再突破,而且公正和美德被执怀疑态度的人稀释或调侃得令人置疑。如今是互联网时代,至少有7亿中国人不但是公民而且是敢于发

表意见的网民,任何虚假的宣传都会被人戳破、唾弃。所以,尊重历史才是最佳选择。我有理由相信,在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里,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崇尚正直、宽容、公平和公正的。

我写《来生再见》《湖南骡子》和《黄埔四期》,可以说是一种公心,为对得起那些在“1.28”松沪抗战、忻口会战、松沪会战、兰封会战、武汉会战、长沙一、二、三、四次会战、桂南会战、中条山会战和豫中会战以及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中阵亡的先烈们,他们是为国捐躯,而不是为钱财而亡,应该书写也值得书写。上一辈作家,尽管他们活着时可能是抗战历史的见证人,但由于政治原因,他们舍弃了这类题材。因此,这是我必须做的。二是为了文学,为填补缺失。这话很大,未免自不量力。我想说的是,当我们的子孙后代里有人想看看抗战小说,了解一下祖先于二战中有何作为,却只能看到干巴巴的文献记载,而看不到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,他们会怎么想?他们会不会埋怨我们没给他们留下点东西?这是私心,写一部大文学作品的私心。这个私心又与信心相伴。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说:有信心的人,可以化渺小为伟大,化平庸为神奇。法国19世纪作家维克多·雨果说: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,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我们这代作家,生于上世纪中叶,过过苦日子,见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,亲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,有点儿承上启下,面对历史,就应该有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。我因机缘知道了上辈人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那些事,知道了而不写就有些寝食不安,也许这就叫大爱吧。

责任编辑:黄声波